

# 二〇一一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得獎感言

李爽學\*



過去五年來，我的研究主要有《明末耶穌會證道故事考證》，其後因為陸續又有不少新的發現，而某些詮解也有待加入三部分。首先和舊作有關：我在二〇〇五年出版《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證》，所以我將此書從頭到尾又潤飾、修補了一遍，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出版了「修訂版」。其次，我和廣州中山大學的法籍耶穌會士梅謙立（Thierry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合聘教授。



Meyard) 教授合作，箋注並英譯高一志的《達道紀言》(1636) 成書，書前且撰有長篇導論，書後另有篇幅相當的結論，題為 *Greco-Roman Figures in Confucian China: A Study of Alfonso Vagnone's Illustrations of the Grand Dao*，已送審，不久後應可出版。不過近五年來我心力投注最大的研究，是已寫成的一部有關明末翻譯文學的專書，題為《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此書共分十章，共四十萬字，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此次得獎重點包括書內專章中的五章，分別是〈翻譯·政治·教爭：龍華民譯《聖若撒法始末》再探〉、〈三面瑪利亞：論高一志《聖母行實》裏的聖母奇跡故事的跨國流變及其意義〉、〈黃金傳說：高一志譯述《天主聖教聖人行實》再探〉、〈著書多格言〉：高一志《譬學》及其與中西修辭學傳統的關係〉與〈中譯第一首「英」詩——艾儒略《聖夢歌》初探〉。

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乃以學術為職志者的大殊榮。我僥倖獲獎，除了多年努力獲得肯定的喜悅外，內心其實還是苦澀與甜美交織。在學術上，我不是一個人云亦云的人，也不容易為學術時潮所左右。如此行世，我幾乎注定要寂寞一生，當然沒想到上述我如此「冷門」的研究也有人賞識，自然感激難以言表。我一向所學，是英美文學。進入博士班後，十八世紀以前的西洋文學與神學都是我專攻的對象。一九九九年，我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之邀回國，當時有感於翻譯一道實非所在國對外的貢獻，而是對內的貢獻，所以我選擇「中文學門」作為我在研究上安身立命之所在。獲獎，我當然高興，而高興的第一件事，是我把一向由外文學門專利的翻譯研究，搬回我認為是最正確的領域中文學門，也強化了翻譯研究在這個學門的研究方向裡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我的研究實屬翻譯史的研究。我進入明末這個領域之後，才曉得翻譯史在文學史上扮演的地位重要無比。古中國是一個不甚重視翻譯的國家，但文學演變之受翻譯影響，幾乎無代無之，只可惜古往今來的研究者不是予以否認，就是視而不見。所以歷史漏洞之多，罄竹難書。我的研究不敢誇稱一流，但是「填補」了不少中國文學史上的漏洞，這點我倒敢自詡。此番獲獎，這是讓我甚感快慰處之一。

第三點，在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學術領域裡，學界一向不認為「文學」是天主教耶穌會的貢獻。荷蘭的漢學大師許理和 (Erik Zürcher) 甚至認為在高一志的《譬學》之外，耶穌會由歐洲帶來的西方學術，沒有「文學」這兩個

字。我出入歐美與中國各大圖館訪書所得，結論卻非如此。二〇〇五年我所出版的《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一書，大致已推翻學界在這方面多年的成見，此次獲獎的論文更是如此。我相信拙著問世之後，必然可以進一步說明明末耶穌會士譯述為中文的歐洲文學作品有多少，從而再度為我們證實明清之際西學東漸裡「西學」中的「文學」成分有多少。

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最高興的事莫過奠定新猷，為所致力之學術再開一境，而我何其有幸，從中文學門到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專業領域，我都能見人所未見，以「文學上的翻譯研究」為這些學門加磚添瓦，彌補歷史之不足，甚至開疆闢土，為這些學門再指出一條來者可以繼續耕耘的道路。

我能有今天這些小成就，一大部分要感謝國科會長年來對我的支持，也要感謝中央研究院的深耕計畫在研究上給我的方便，中國文哲研究所對我一向包容有加，不以中文學門的異端視之，也令我銘感在心。研究上的甘苦，家慈、岳母、內人、小女和犬子，當然知我最深，我點滴都在心頭。恩師余國藩教授、我的研究團隊給我支持，我也難以言謝而略過。最後，我要把這個臺灣學術界最高的榮譽之一獻給先父和先岳人。倘若沒有他們生前的鞭策、期待與關愛，倘若沒有他們生前的寬容，讓我孜孜研究而不以人子應盡的孝道見責，我真不敢相信在學術上我能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感謝之外，我內心如今充滿的竟然是無限的遺憾。